



叙反对派授权组建过渡政府

叙利亚一朝变天,谁是击败政府军的主力

据亲叙利亚反对派媒体9日报道,反对派授权“叙利亚救国政府”的穆罕默德·巴希尔组建叙利亚过渡政府。“叙利亚救国政府”由叙反对派成立,巴希尔担任其总理。

叙利亚一朝变天。在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快速垮台的过程中,武装组织“解放叙利亚”联盟(又译“沙姆解放组织”)被认为是击败政府军的主力。

“解放叙利亚”联盟 曾是“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

“解放叙利亚”联盟,其前身“支持阵线”形成于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曾是“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一度主要由带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圣战分子构成,通过发动武装袭击、自杀式袭击和暗杀等手段,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当时曾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恐怖组织。2016年7月,朱拉尼宣布“支持阵线”更名为“征服阵线”,称更名后的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外部实体”。这被外界解读为与“基地”组织切割。次年1月,他宣布解散“征服阵线”并建立更为广泛的武装联盟,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叙利亚”联盟。

2016年,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渐式微,叙政府军开始大举收复失地。通过这一手段,阿萨德政府收复了大片地区。经过一系列争斗,“解放叙利亚”联盟逐步击败同样盘踞此地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残余力量,从诸多反对派武装中脱颖而出。自2019年起,该组织对伊德利卜省绝大多数区域实施控制,还成立了所谓“叙利亚救国政府”,负责控制区内的民政管理事务。

从“支持阵线”渐变成“解放叙利亚”联盟后,朱拉尼宣称联盟希望用一个“受伊斯兰教义启发的政府”取代阿萨德政府,以获得更多国际支持。



这是12月8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拍摄的武装人员。新华社发

相关新闻

方便与“沙姆解放组织”建立更密切联系 美国或取消恐怖组织认定

当地时间12月8日,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向媒体表示,美国政府不排除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以便与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多个派系在叙利亚展开博弈,发起本轮攻势的“沙姆解放组织”,曾在2018年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近期,随着叙利亚局势升级,美国对“沙姆解放组织”是恐怖组织的认定,出现松动迹象。美国总统拜登8日表示,美国政府将与叙利亚各派别接

朱拉尼其人 曾被捕被关进美军监狱

朱拉尼1982年出生于沙特首都利雅得,7岁时随全家返回大马士革。其父侯赛因·沙拉一度还担任过叙总理的石油经济顾问。

朱拉尼曾对媒体表示,“9·11”事件对年轻时的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由于对袭击者的崇拜,他对圣战产生了兴趣,开始参加大马士革秘密举行的圣战布道活动,据称他在穿着和说话方式上都曾刻意效仿“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

为抵抗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他从小马士革乘坐长途巴士前往巴格达,后被捕被关进美军在伊拉克设立的“布卡营”监狱,在那里结识了多位“基地”组织头目。2011年出狱后,朱拉尼拿着大量来自“基地”组织的资金,返回叙利亚组建分支“支持阵线”。

在武装组织攻占阿勒颇和哈马后,朱拉尼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穿迷彩服或长袍,而是穿着衬衫西装,这被认为是从着装上展现世俗化的转变。

未来局势不明 执政愿景还存在相当难度

朱拉尼在采访中提出执政愿景,他承诺将尊重所有宗教和民族团体,确保他们在其统治下安全地生活。虽然自身意愿强烈,但从目前形势看,朱拉尼的执政愿景恐怕还存在相当难度。

叙利亚境内政治势力和武装派别混杂。在推翻了共同的目标阿萨德政府后,宗教背景、外部支持势力、利益诉求都相距甚远的各路势力会消除隔阂开展合作,还是互相火拼以争夺利益,一切都是未知数。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各派势力谈妥组建政府,那么朱拉尼及其领导的“解放叙利亚”联盟会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掌握相当的话语权。

(据新华网、央视新闻)

韩国现任总统 首次被禁止出境

当地时间12月9日下午,韩国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长裴相业在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示,已经于当地时间9日15时30分对因涉嫌嫌犯“内乱罪”而被立案的总统尹锡悦采取了禁止出境措施。这是韩国首次对现任总统采取禁止出境措施。

当天早些时候,负责调查紧急戒严风波的韩国警察厅下属国家调查本部特别调查团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已对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前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前反间谍司令官吕寅良、陆军参谋总长朴安洙采取了紧急禁止出境措施。

共同民主党9日向国会提交“12·3尹锡悦内乱事态特检法”,并提请处理“金建希特检法”。共同民主党计划推动在12日和14日的国会全体会议上分别对“金建希特检法”和“内乱特检法”进行表决。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河圭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法律上看,目前韩国军队的统帅权仍掌握在总统手中。

(据新华网)

印度德里数十所学校 遭炸弹威胁

印度德里警方9日说,该市至少40所学校当天收到经由电子邮件发出的炸弹威胁。

《印度斯坦时报》9日报道,最早收到恐吓邮件的两所学校分别于清晨6时许和7时许收到相关邮件。发件人声称,已在校内建筑内放置多枚炸弹,如拿不到3万美元,就会引爆炸弹。两校行政部门随即安排学生回家,警察携警犬与消防人员、炸弹探测小组等到现场搜索,未发现可疑物品。

据路透社报道,政府数据显示,今年年初至11月中旬,印度的航空公司和机场共遭到999起“炸弹”威胁,12人被捕。

今年5月,德里及其周边有50多所学校收到类似的恐吓邮件,后来也被证明是恶作剧。

(据环球时报)

墨尔本犹太会堂遭纵火 警方正在追捕3名嫌犯

澳大利亚政府9日将上周发生在墨尔本的犹太会堂纵火案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警方正在追捕3名嫌疑人。

本月6日凌晨,墨尔本市内的阿达以色列犹太会堂遭3名蒙面人纵火。会堂建筑大面积损坏,并有一人受伤。澳大利亚联邦、州警方官员以及情报机构9日会商,将此案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此案已被移交给联合反恐小组调查。

墨尔本犹太会堂纵火案发生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声,批评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纵容澳国内反犹主义。

阿尔巴尼斯8日谴责此次纵火案,称澳大利亚国内反犹主义抬头“令人忧虑”。

本轮巴以冲突去年10月爆发以来,澳大利亚国内发生多次声援巴勒斯坦、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过度使用武力的示威活动。

(据中国新闻网)



古代的举子会试



制图/左骏

曾国藩亲自辅导

乡会试的日子里,举子们紧张备考是自不待言的。同时,和他们一起忙碌的,还有在京为官的同乡们。这些京官,不但曾经用自己的家宅,接待过来京赶考的同乡,还曾捐宅或集资营建会馆,并承担起会馆的运营与管理。同时,他们又给举子们做必要的授课,指导答卷的方式方法、讲述考试经验等等,事无巨细,传授点拨。

《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记载:“闰三月,三十日,……中饭后,春凤、毓凌九兄弟来”;“四月初五日,下半年,吴春凤、曾心斋来,久谈。……拟为心斋做策本,无所成”;“初六日,……又拟为心斋做策,仅改数句,文思迟钝,可恨!”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曾国藩先生为吴春凤、曾心斋两位同乡所作指导有八次,而且,还有做策文的具体示范。不但自己动手,还去登门延请与自己同年中进士的钱念仙为试子修改策文。可以想见,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多次晤谈会涉及策文的主题、内容、结构及行文等各个方面,乃至对相关社会情况及官方对策的讨论等。最后到了考试的日子,曾先生还专门到会馆,送吴春凤、曾心斋二人赴考场。

“练大卷”

来自其他地方的京官也会同样为家乡试子竭尽所能。如果说曾先生对同乡试子的考前辅导是一打一,或一对二三,那么还有在会馆对殿试者的集体考前模拟训练——“练大卷”。

据《闾中会馆志》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来京殿试者均同聚福州新馆,每日群踔榕荫练大卷。张(贞午)侍卿(元奇)、沈爱苍侍郎(瑜庆)、郭春榆侍郎(曾妍)、陈玉苍侍郎(璧),皆轮流到馆督视练卷。”这记载,让我们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榕荫堂里,试子们“群踔”着,练习小楷楷书殿试大卷。同乡京官在他们中间慢慢地穿行,不时停下来,点评、校正。那是殿试前一连数日的“集训”,每天的导师不同,但都是曾经殿试且金榜题名京城高官。

文中所谓“练大卷”,说白了,就是练习殿试试卷的书写。都说科举考试特别重视考生的“书法”,究其实,那是对公文书写的基本要求。殿试,在皇帝面前答卷,更是要展示书写的训练有素且一丝不苟,不能有半点失误。

考生在殿试前的准备,除答卷的内容之外,书写字迹讲究,务求中规中矩,且墨迹始终如一。同时,还要有书写速度的考虑,即要在限定的时间里,完成数千言文字书写。难怪当年在福州新馆有“每日群踔榕荫练大卷”的特别训练。

“快马递诗片”

《闾中会馆志》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两宫驻蹕颐和园。按照规定,殿试设有阅卷大臣,有资格的候选人要在殿试前夜到园候宣。福建籍京官们估计,时任商部左侍郎的陈玉苍最有可能被任命为殿试阅卷大臣,于是,陈侍郎即安排部员力钧备健马于福州新馆,在殿试即将开场之前,将试子殿试的策文第一行填写为“诗片”,派差役半夜骑马直奔颐和园。天未明,诗片送到,阅卷大臣的任命也正好下达,陈侍郎果承软派。因而,陈侍郎的们大多数列殿试二甲。这里说到的门人,即陈侍郎在福州凤池书院执教时的学生。这便是当年一个“公开的秘密”,即所谓“快马递诗片”。

《旧京琐记》“卷六·考试”中写到,同治、光绪以来中进士的,一种是拔贡小京官,经考试成为军机处章京,其人的才学及能力,在朝廷枢要部门,已经有了不错的声誉;再一种是边省举子中的才俊,会试未中,留都过夏,“锐意结交时流,平日师友,早有定评”。他们“平时以揣摩遍诣师门,或世交当道之有阅卷资格者”。及至出场应试,就将考卷中诗作的前两句、殿试则将策之前一行,“驰马递递,力不足则朋好代递之,至次日阅卷命下,即不及矣”。能参加殿试而得中的,一般不过百十人,大凡“夙精书法,或有力之诗片已递到者为有望”。其余考生,“自知不能入选,亦不作此梦想矣”。《旧京琐记》的这个记载,说明“快马递诗片”是当时各地京官和考生都知道的“节目”。

《安康康平室随笔》一书有记述道:“本朝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他们“大都工于书法,或当时知名之士,既登朝籍,遇事更得风气之先”。而殿试阅卷诸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赏识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

基于此,阅卷时,即便是“糊名”(将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用纸糊起来)了,阅卷诸大臣看试卷上的字迹,也能辨识二三,何况还有“诗片”提醒。

除上述故实之外,当年还有人给乡试的试子办培训班的。如何间会馆,位于果子巷69号(旧为驴驹胡同路北六号),乾隆二十四年由任丘舒成龙捐建。乾隆三十五年(770年)舒先生再度捐资修缮并建河间客寓,《增修河间会馆内外房屋创建河间客寓碑记》中说道:“会馆之右有房一所,房主现让卖给,或可做任邱客馆书屋,乡试之前有早进京者诵读其间,就教名师寒士,酌给薪水。事成公另为筹办。”尽管碑记中说这书屋是来年的计划,但也可见当时乡试试子会有提前进京,寻师求教者,也会有寒士设塾,以为试子授课辅导的。这“寒士”,或是以往落第的举子,亦未可知。

(据《北京青年报》)

漫谈琵琶

琵琶素有“民乐之王”和“弹拨乐器首座”的雅称。据传琵琶最早称为“批把”,因弹拨手法而得名:向前弹出叫“批”,向后挑起来叫“把”,以其制作材料为木类而叫“批把”。

关于琵琶最早的文字记载,是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批把,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比应劭稍晚的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写道:“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说明琵琶在此时比较流行。直到魏晋时期,人们才把批把改为“琴”字头的琵琶,归为琴瑟之类的乐器。

琵琶的外形颇具特色,有不少东西因形似琵琶而得名。比如水果枇杷“因其叶似琵琶而得名”。鸡腿的小腿部分因形状像琵琶而得名“琵琶腿”。以乐器来为物品命名,这还是比较少见的,可见琵琶长久以来在民间是有着较高的知名度的。

琵琶还与蝎子有着较深的缘分。《西游记》中有一个蝎子精,住在琵琶洞里。在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还给她增加了一把原著中所没有的琵琶作为武器,让人印象深刻,人们甚至直呼她为“琵琶精”。原著中,蝎子精被如来星官降伏后现出原形,本相“是个琵琶来大小的蝎子精”。用琵琶大小来形容蝎子是有传统的。

晋代干宝《搜神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亭子,不能住人,谁住进去就会死,有一个会法术的书生,他发现亭子里有老公鸡、老母猪和老蝎子三个怪物,他杀了三个怪物,从此亭子就安全了。在杀死蝎子时,作者说蝎子像个大琵琶。“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提到“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

《封神演义》中还真有一个玉石琵琶精,她可以变化为人,但实际上是个琵琶,被姜子牙烧死后现出本相,就是一把琵琶。

琵琶成精很可能是以讹传讹,其本体应该是蝎子。民间称蝎子为琵琶虫。作为“五毒之首”的蝎子是古人常见的虫子。作为“民乐之王”,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琵琶都是最有国民知名度的乐器之一。在长期的观察中,人们发现,琵琶和蝎子很像。直颈琵琶一头细长一头圆宽,看起来形似蝎子,琴头处两侧的琴轴,还颇有几分像蝎子腿;曲颈琵琶翘起来的琴头还像蝎子尾巴。

在南北朝时,琵琶还有文人彰显高身份的一种标志。南朝琵琶经常为声乐伴奏,声乐的音乐即魏晋时代开始出现的“新声”,文字多是流行于民间的曲词,或是文人创作的歌词。

唐代的琵琶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上至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奏,都少不了琵琶的身影。琵琶的乐队领奏地位也是在那时奠定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生动描绘了琵琶演奏场景和其音乐效果:“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记录了当时著名乐师康昆仑与段善本琵琶斗乐的事。此事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当时长安大旱,设坛祈雨,由东西两市请琵琶大师段善本与康昆仑在长安天门街弹琵琶斗乐。在这场民间祀神赛会中,弹琵琶是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可以看出,琵琶承担了娱乐神人的功能。两人一为宫廷琵琶名手,一为寺院中的僧人。所奏乐曲皆是当时社会流行曲目。

当时,琵琶还被用于占卜。据学者研究,迟至于唐中宗时期,琵琶占卜已是一项专业化的职业活动,出现了专门以琵琶算命“师婆”。琵琶作为卜器参与民间占卜,承担了请神、获得神谕的功能,用于占卜吉凶、求算仕途。李贺长诗《恼公》中说:“跳脱看人命,琵琶道吉凶。王时应运七,夫位在三宫。”该诗记述了一位女子通过琵琶卜算丈夫仕途之事。可以说,在唐代社会,以“琵琶道吉凶”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弹奏琵琶以娱神,既与传统的乐感天人的认识相通,还与南北朝以来社会以琵琶歌舞“种种伎乐供养佛”的认识密切相关。

(据《光明日报》)

